

〔美〕吉拉德 M·米耶 都德莱·西尔斯 编
刘 鹤 梁钧平 杨焕昌 陈 研 译
史强育 黄铁鹰 校

0033/10

经济发展理论的 十位大师



中财 B0023137

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藏书

总号 380354

书号

中国工人出版社

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

〔美〕吉拉德·M·米耶
都德莱·西尔斯 编

刘 鹤 梁钧平 译
杨焕昌 陈 研
史强育 黄铁鹰 校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昌平长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125 字数：336000

1990年4月第1版 199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80册

ISBN 7—5008—0554—3 /F·38 定价：8.50元

805051

原 序

开拓者——在任何领域——都是富有创造力的勇敢的人们。假如不是这样，他们就不可能甘冒风险，开创新的领域，寻求新的答案。他们不满足于在常规中固步自封，或在显见的理论面前无所创新。他们被一种经久不息的好奇心所激励，这种好奇心驱使他们潜心钻研，探索未知的奥秘。

这就是值得了解他们的原因。

这本新书，就是在国际发展经济学复杂领域内了解这些开拓者的始端。在这门艰深的学科中，有10位开拓者——大师。过去的40年里，他们使有关发展问题的争论趋于明确。他们不仅是具有献身精神的导师和学者，而且是积极负责的实践者。

这里，我们将读到他们公正地反映自己开创性工作的文章，以及他们年轻的同行们富有洞察力的评论。总之，这本书就象一份智慧的菜谱，刺激、有争议，而又营养丰富。

我们世界银行荣幸地主持了这些演讲，我们期待着继续进行类似的活动。毫无疑问，致力于国际发展是我们时代的主要历史运动之一，在以后几十年里所取得的成果将形成贯穿下一世纪国际生活的特征。

随着发展的继续和形势的变化，这个世界在发展战略方面需要涌现不断进取的革新者。让我们祝愿未来的开拓者象本书所纪念的那些一样幸运。

世界银行行长

A·W·克劳森

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陆续地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奴役地位，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他们面临的重大任务是，在获得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之后，如何进一步取得经济上的迅速发展。有关的世界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下，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促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的途径。于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一课题就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共同耕耘的园地，也是他们进行辩论的主题。目前国外各大学有关经济的系科均讲授发展经济学，许多大学设立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心。每年都有许多发展经济学和研究经济发展的某一方面以及某一特定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论著出版问世，这些情况都表明国外对发展经济学的重视。

四十年代后半期和整个五十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具有开创性论点并成为代表人物的发展经济学家现在被称为发展的开拓者。为了回顾当时情况并结合着发展经济学的现状来评价这一时期的开拓者们的论点，在世界银行的主持下，由这些开拓者们自己进行总结并辅以专家们的评论。这样的总结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创举，《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一书就是这次有意义活动的记录。

这里要指出的是，从一开始，发展经济学家的论点就不一致。他们之间的分歧可以集中到一个问题上，即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微观经济学能不能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或者说单纯依靠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和对外自由贸易的方式能不能迅

速而顺利地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形成时期的开拓者们对这个问题大都持否定态度。其代表人物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人刘易斯(A·Lewis)、缪尔达尔(G·Myrdal)以及纳克斯(R·Nurkse)、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赫尔希曼(A·O·Hirschman)、普雷维什(P·Prebisch)和辛格(H·Singer)等人。他一般被称为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家。他们的论点在发展经济学形成时期占了上风并付诸了实践。对以上问题持肯定态度的有鲍尔(P·T·Bauer)、凡纳(J·Viner)、哈勃勒(G·Haberler)、迈英特(H·Myint)以及和刘易斯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舒尔茨(T·W·Schultz)等代表人物。随着六十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势态的变化，鲍尔等人的论点变得重要起来并具有指导实践的现实意义。因此六十和七十年代称为发展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复苏时期。

持结构主义观点的开拓者们首先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点。那时，这些国家刚刚获得独立，国民经济仍然具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在落后的本土原有的经济中，存在着一些由殖民者建立的先进企业，如农业中的种植园，工业中的采矿业和交通、动力企业等。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把本土经济比喻为汪洋大海，那么先进的企业只是这片大海中的一些孤立小岛。因此这些开拓者把这种对立状态的经济结构称之为二元结构或称两重性(dualism)。他们认为二元结构可以表现为本土固有的意识形态和先进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也可以表现为落后的技术和先进的技术之间的对立；还可以表现为落后的具有隐藏失业的农业与少量先进工业之间的对立。

其次，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经常处于贫穷的恶性循环之中。纳克斯首创其说。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贫穷，劳动生产率低下，因此国民收入不高。这一方面导致资本积累率很低，另一方面则导致市场需求狭小，使实物资本的供给和对其需求始终保持在一个低的水平上。这又导致劳动生产率

低下，国民收入水平无法提高。如此推论下去，形成了贫穷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如何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纳克斯和其他持结构主义观点的开拓者都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扩大投资，实行工业化。大致可以这样说，即形成时期的发展理论也就是工业化理论。其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扩大积累的比重，增加厂房机器设备等实物资本的使用量。

如何进行工业化呢？开拓者们也有不同的论点。罗森斯坦-罗丹提出大力推动和平衡发展理论。他认为要取得成功，必须有必不可少的一定数量的投资，并且保持各部门同步平衡发展，以便发挥各部门的互相补充的作用，保持必要的市场容量。赫尔希曼则应用连锁原理提出不平衡发展理论，认为一个工业部门既有它的先行的，又有后续的工业部门。投资于关键性工业部门，不但它自身得到发展，而且会带动其先行的和后续的工业的发展。因此，工业化是一个连续过程，不必须各行各业同时并举。罗斯托（W·W·Rostow）提出称为发展阶段论的历史模型，论证起飞阶段的重要性。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超出国民收入的一定比重以后，就可进行经济起飞，靠着自身的积累，持续地发展下去，就如同飞机得到足够的冲力就可离开跑道飞上蓝天，然后就能平稳地向前航行一样。刘易斯从工业化的人力保证方面着眼，提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中，具有无限供应的剩余劳动力，不但可以转移到工业中去，而且是稳定工业中工资水平的因素，从而保证了资本家的利润不断扩大，再投资的不断增加，工业化得以顺利进展。以上这些论点各自强调了工业化的一个侧面，因此是互相补充的。有的如平衡发展和不平衡发展论点看起来似乎是对立的，但是只要不走极端，在实践中，这两种发展方式会同时存在。

由谁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呢？有些开拓者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存在着二元结构，牢固而不易变化；凭借市场调节力量和私人经济活动，很难迅速改变这种状态；应由国家担

当规划和推动工业化的重任，而国家推动工业化的有力手段则是像五年计划那样的综合性总体计划，以规划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各部门的投资比例。这种主张几乎被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接受并积极付诸实施，以便迅速实现工业化。

持结构主义观点的先驱者们不但否定市场调节功能，也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理论和自由贸易政策。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理论表明，进行贸易的双方都是以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进行交换，因此国际贸易能使同量的投入得到更多的商品，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此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普雷维什、辛格和缪尔德尔等人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指出自十九世纪以来，作为殖民地出口大宗的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因此认为，对外贸易非但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反而是破坏增长的因素，从而全面否定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普雷维什提出中心与外围理论。他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中心，发展中国家作为它的外围。认为技术进步发源于中心，但由于中心的经济垄断地位，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和降低价格的积极作用，并没有扩散到外围地区，外围地区只是向中心提供廉价的初级产品。这种经济联系自然遭到他的否定。

通过以上分析，持结构主义观点的开拓者提出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内向发展战略，即进口替代战略。就是实行保护本国新兴工业的政策，使其生产能替代原先进口的最终产品，满足国内市场需要。有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实行了这个战略。

在发展经济学形成时期，鲍尔一直主张取新古典理论之长，发挥市场调节功能，刺激私人经济活动，减少国家干预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反对结构主义者忽视市场经济的论点。哈勃勒尔，凡纳和迈英特等人根据新古典自由贸易理论，主张执行外向的以扩大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认为即使出口初级产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有利的。六十年代初舒尔茨论证了，通过对农民的合适的物质刺激，市场机制即可调节农业的发

展，而农民也因此富裕起来。并且提出投资于人力资本，即投资于教育科研事业的重要性。他的论点纠正了结构主义者着重工业忽视农业，着重实物投资，忽视人力资源投资的偏向。

在六十年代，随着农业中绿色革命取得的进展，特别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推行外向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逐渐发展成为新兴的工业化经济以后，发展经济学的认识为之一变。市场调节功能，对外贸易的积极作用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适用性都重新得到肯定。在发展经济学中，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成为新古典主义复苏时期。这一时期的论点和经验已编印成《发展的开拓者》第二集出版问世。

如何来评价发展经济学形成时期持结构主义观点的开拓者们的论点呢？我们认为它们是时代的产儿，时代的呼声，集中表现了发展中国家要求经济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人民迅速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良好愿望。尽管理论上不是那样完善，但却是开创性的。不可能想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需要国家进行规划、领导和调节，即使是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时也是这样。但是详尽的无所不包的综合性总体计划则是不必要的。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看，它无法全面实现，从其后果看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会受到很大的损害；从市场调节功能和外向经济来看，它也是不必要的。但国家的总体规划必须存在。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和以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前者为后者准备条件，没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即使出口初级产品也是困难的；后者是前者的自然转变，如果只停留在进口替代阶段就会变成一个消极的战略，很可能形成故步自封缺乏效率，停滞落后的局面；进口替代的目的如果为的是再度出口，那末通过内外交流和内外竞争就会搞活经济，取得迅速进展。总之，在发展经济学的演进中，持结构主义观点的开拓者必然占有应有的地位。

现在刘鹤、梁钧平、杨焕昌、陈研等同志已将梅耶和西尔斯编著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一书全文译出，并由中国工

人出版社出版。译文忠实原著，明白流畅。为关心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同志们提供了一本宝贵的参考资料。

范家骥

一九八八年元月于剑桥马歇尔图书馆

前 言

发展经济学的形成阶段

吉拉德·M·米耶

发展经济学的主要题材，同时包含在最老的和最新的经济学分支中。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始，古典经济学家就致力于揭示经济发展的源泉，分析经济变化的长期进程。诚如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告诉我们的那样，斯密所称的“财富的自然积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发展经济学”。然而，长期以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边际分析引入了静态的思维模式，把注意力转向较为狭窄的资源分配和交换理论问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萧条，促成了分析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短期商业循环和长期停滞威胁的凯恩斯主义的产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学才又把增长和发展当作重大的研究课题。就许多方面而言，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成为以亚非拉国家的发展问题为中心的“新”的发展经济学的开拓阶段。^①

殖民地背景

在1955年所著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刘易斯指出：“由于经济增长理论再一次在世界范围引起兴趣，由于大约一个世纪以来没有发表过一篇全面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一本这样的书似乎是需要的。曾经涉及这一广泛领域的最后一部伟大的

著作是1848年出版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问题》。”^②

经济学思想一般来讲源于解决政策问题的需要，有关发展的早期思想当然也是这样。发展经济学并不是以一个正式的理论学科的姿态产生的，而是在决策者向政府建议将自己的国家从长期的贫困中解救出来，能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的需要中，作为一个实践性的课题形成的。就象他们的文章和传记所展示的那样，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发展理论的许多开拓者都活跃在决策岗位上。

对战后国际社会重新建设的关注，促使有关发展问题的三部早期著作的诞生：欧琴·斯达莱的《世界经济发展》^③，克特·曼德尔鲍姆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④和保尔·N·罗森斯坦-罗丹的文章《东欧与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⑤。

斯达莱认识到：战后世界上许多地区都存在一种要求经济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他的研究探讨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特别是以发展为目的进行的国际投资和生产、消费及贸易的转移对先进工业国家所产生的影响。

曼德尔鲍姆试图为东欧和东南欧人口众多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建立数量模型。他认为这一区域的“萧条地区”苦于缺少工业的发展，这一情形将增长着的人口驱向农村和城市中生生产率很低的职业。他在前言中指出：“人口增长、贫困和工业匮乏的恶性循环绝不仅限于欧洲的这一角落，这种现象也在其他欧洲国家存在着，最明显的则是远东。以东南欧作为例证部分是出于偶然，部分是由于有关东南欧情况的资料比其他人口稠密地区的资料稍稍丰富一些。”曼德尔鲍姆提出，“人口稠密的落后国家”工业化的经济症结在于大量隐蔽的农村失业现象。提高就业的主要障碍在于需求不足和资本匮乏。为了克服这些现象，对落后地区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这样，再分配措施才可能提高“必需的消费”从而缓解潜在的需求不足，并解除贫困。这些措施还可能建立国

家强迫储蓄的制度，来支持较高的资本形成率。生产率的增加以及某些技术所需的改进都是导源于在近三十年内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⑥

罗森斯坦—罗丹在“自然没有飞跃”一章中重述了他的发展理论的基本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短时期内，亚洲、非洲殖民地的崩溃向经济学家提出了发展问题。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的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在战后得到了满足，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完全溃退了。《联合国宪章》指出了殖民地解放的目标。在战后短短的五年里，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都获得了独立。殖民主义比战争刚刚结束时更加迅速地消亡，更多的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⑦

几百年的历史被颠倒了。与国际联盟不同，联合国很快被纠缠在殖民地问题里。亚非集团标志着世界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亚非人民通过民族主义及政治独立维护自己的利益，形成了发展的动力。新兴国家的领袖们坚决主张他们的发展问题应当引起国际关注。十八世纪被认为是“粗暴野蛮”，十九世纪被认为是“落后”，战前被认为是“不发达”的地区，现在变成了“欠发达国家”或“贫困国家”——此外，还有“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但是，如何获得发展？尽管政治上的独立能够通过立法来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却不能。民族主义能够强化加速经济变革的要求，却不能主观促成这一进程。明晰发展的动力是需要的，而且，为了支持这些动力而制定适当的政策则是必不可少的。要完成这一使命，就需要经济学家们的积极参与。

殖民地经济的早期研究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从前有关殖民地经济的课程，主要是为满足那些在殖民地当局工作或希望进入殖民地的人而开设的。回想起来，在这些课程中，世界被假定为

静止的。贸易波动一直是两次大战间歇时期的基本问题，并且主要目标——至少是间接地——是稳定经济。这既反映了争夺殖民地权力的需要（特别是那些对商品出口举足轻重的非洲感兴趣的人），又反映了当时盛行的凯恩斯模式。就社会和政治变革而言，它被描述成需要经济稳定的渐进过程，政府的经济作用十分有限。战争不仅瓦解了殖民体系，而且冲破了人们观察问题的狭隘方法。新独立的国家继而承受的是经济发展的压力，而不是稳定经济的压力。

四十年代以前，人们很少使用“经济发展”一词。^⑧在开创时期，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经济发展的标志解释成不发达国家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然而，一些人则强调发展意味着增长加变化，特别是价值观和制度的变化。^⑨对于不发达国家，赫拉·明特还把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不发达”与居民的经济“落后”区分开来。明特提出：“研究落后国家比研究发达国家更需要透过传统的社会表述的帷幕，深入到它的需要、活动和环境的相互适应的真正过程中去……实际上，不从主体方面考虑落后地区人的基本问题，单纯构想经济的宏观模式是很危险的。”^⑩

发展的含义，在数量上也有所描述。西蒙·库兹涅茨不辞辛劳地收集了大量经验数据。^⑪在强调一个国家累积的大量的人均产量增长时，库兹涅茨还提到增长率的含义——必然随之产生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和制度的极大改善以确保人均产量的增长。

然而，在这以前，雅克·维纳对流行的发展标准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他提出，即使人均财富、收入和生产都在增加，人口仍可能大量增长，生活在贫困线上或贫困线以下，没有知识、病弱、营养不良的人数可能与全部人口的人均收入同步增长。^⑫

如果新兴的国家面临发展问题，他们就必须把视野越出殖民地经济的局限。诺贝尔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发现，“殖民地理论”仅仅是一种遁辞，企图为殖民统治造成的不发达状况推卸责任。^⑬发展的不成功常常被归咎为热带的气候条件，人口压力，

资源匮乏，或是太僵硬的不合理体制和使人们对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缺乏反应的价值观，而战后非殖民化浪潮使形势完全不同了。

再者，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看来，如果从前的殖民地国家没有什么社会进步，他们落入共产主义统治的危险是很大的；投资机会、进入市场的途径和原料来源都将会缩减。此外，战争宣传强化了平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倾向，因而，五十年代产生了来自富国的大规模财政和技术援助的政治基础。欧洲和北美的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分析“不发达问题”。所以，发展经济学的起源是“政治策略的殖民地经济学”。^⑭

战后国际组织

战争期间，罗斯福总统宣称“四个自由”，包括“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消除贫困的自由”作为战后西方盟国的目标。《联合国宪章》在其目标中也包括了致力“提高生活水平，充分就业和社会经济条件的进步和发展”。然而，布雷顿森林会议仍旧没有实现这些愿望，尽管在这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似乎更重视国际发展的重要性。

从成员国来看，似乎很清楚，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世界银行显然是第二位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旧是殖民地，只有其中一部分，主要是拉美独立国家应邀到会。政治力量掌握在美英手中。很显然，发展问题一开始就没有提到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议事日程上来。

关于应邀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国家，凯恩斯爵士在给英国财政部的信中写道：“有21个被邀请的国家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这些国家是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利比里亚、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菲律宾、委内瑞拉、秘鲁、乌拉圭、埃塞俄比

亚、冰岛、伊朗、伊拉克、卢森堡。最可怕的乌合之众聚会了几十年。这些国家或许还应该算上埃及、智利以及(在现在的情况下)南斯拉夫。”^⑤

在布雷顿森林，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新的原料生产国，而不是面临着普遍的发展问题的国家。发展的综合战略和加速国家发展的政策仍然没有明确。巴西代表团提出了一个关于召开稳定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国际会议的草案，宣称“两次战争间隔时期初级产品价格的波动与大规模失业循环一样是一种祸根”，为了成功地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目标，促进原料和农产品价格的稳定被认为是必要的。古巴赞同召开一个会议，促进主要商品的有秩序的买卖。哥伦比亚代表团提出今后的商品政策和协定应当考虑到“扩大食品和原料消费市场的需要，这些商品战前的价格同工业品价格显然远远不成比例”，而“初级产品生产国不得不从大工业国购买这些工业品”。玻利维亚关注于组织和执行旨在维持公正和稳定的价格的国际商品协定方面的合作，以及保证在全世界有秩序地分配原料的条款。但是，同秘鲁、巴西、智利、玻利维亚和古巴提出的“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公平的价格进行主要商品买卖”的联合议案一样，这些提议都落空了。^⑥

1947年，53个国家的代表云集哈瓦那，讨论成立国际贸易组织（ITO），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补充。《哈瓦那宣言》建议，国际贸易组织不仅要抑制贸易壁垒，还要处理私人对外投资、幼稚工业、国际商品协定、政府贸易、卡特尔和限制性商业行为问题。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起初只是《哈瓦那宣言》被批准之前制定的暂时的权宜之计。但是，由于国际贸易组织遭到美国国会的反对，^⑦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就作为差强人意的替代物而存在下来，并从1955年起成为永久性的协定。

在最初的条款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确减轻了不发达国家的一些负担。协定特别提到“只能维持低生活水平和处于发展的

初级阶段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获得了下列特权：有权撤销关税减免、为保护幼稚工业提高税率、“为保障其对外金融地位和保证足够的储备以执行其经济发展计划”而对进口实行配额限制。^⑧在以后的条款里，发展中国家能够实行进口替代计划和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为由实行进口配额来保护本国工业。

然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并没有允许发展中国家享有如他们在《哈瓦那宣言》中寻求的那种特殊待遇。是否允许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制定不同的贸易准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对不发达国家实行特殊的有区别的待遇的要求，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声中仍然十分强烈。

早期联合国报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一起构成了一个国际公共部门的轮廓。它们为达到充分就业、世界贸易的自由和扩大、汇率的稳定等多重目标，采取有目的的行动。但是，战后建立的这些机构对于新的发展中国家有什么直接利益呢？这些机构是不是仅仅为了对付从前的经济危机——三十年代的大危机而建立的呢？每一时期、每一地区的经济学不仅反映当时的政治需要，而且反映对过去实际发展情况从专业角度进行的关键性解释。英美经济学家仍然在经济学同行中居统治地位，他们在1945年—1950年业务探讨的主题并不是1939年—1945年的战争，这一问题很难用专业性的工具来分析或恰好符合经济学理论的争论。三十年代大萧条仍然是首要的令人关注的题目，学者们对这一时期仍然怀有一些内疚感。经济学家在认识萧条的程度以及分析它的原因或指出恢复经济的途径方面进展很慢。然而，20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凯恩斯革命在此之前解决了全部问题，并且建立了“新经济学”以避免三十年代悲剧的重演。国内制定了充分就业计划，在国际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又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

联合国区域性委员会在考察发展问题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最突出的是1948年成立的设在智利圣地亚哥的拉美经济委员会(ECLA)。1950年,劳尔·普列比什被任命为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在这前一年,普列比什撰写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一书,^⑩以这一研究及以后的研究为基础,拉美经济委员会成为拉丁美洲经济发展问题的公认代言人。在最初的五年里,拉美经济委员会一直精心研究普列比什在上述著作中提到的发展学说。此后,拉美经济委员会致力于以“规划未来发展”为目的的拉美经济研究。^⑪大约从1958年起,拉美经济委员会又把注意力集中在拉美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合作上。

制定规划对于在经验基础上建立总的和部门的计划提供数量指导特别有意义。他们考察了用于以下规划及计算的各种技术:根据对消费预算的研究制定的国内需求计划,以创汇情况为基础制定的进口量计划,对储蓄率及资本—产出率的估计以及对各种投资准则和投入—产出的分析。在确定了增加人均收入的目标之后,这些方法使我们能够选择达到目标的发展途径。

拉美经济委员会的另一部分引人注目的工作是宣传“结构主义”。^⑫简而言之,就是这样的论点:拉丁美洲通货膨胀的原因并不在于过度需求,而是在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的结构上的瓶颈——特别是农业和出口部门的供给不足。^⑬通货膨胀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正统的货币主义方法只能以停止经济发展的进程来抑制通货膨胀。但人们认为结构性的通货膨胀可以用精心设计的经济发展计划来医治。为了克服农业瓶颈和外汇短缺,拉丁美洲国家被建议改变他们的产业和进出口结构。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成为值得提倡的战略。进行这一分析时,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政策强调,需要通过以保护主义政策为基础的进口替代,有计划地实现工业化。

在1949年到1951年间,联合国赞助的几个专家小组发表了三份重要报告。第一份报告——《充分就业的国内和国际措施》